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人生之路》导演阎建钢

期待与年轻人建立起关于青春挫折奋斗的新共鸣

■本报记者 王 彦

电视剧《人生之路》正式官宣亮相。简介中的三条显著信息引发网友关注——部分取材自路遥小说《人生》，著名导演阎建钢执导，原著里高加林等人的开放性命运被续写到了新世纪初的上海。其实早在项目初期，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就用“名作、名导、名城的交融”来期待这次创作。

开播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导演阎建钢，跟着他复盘拍摄过程，聊他的创作思辨。连线中，阎建钢以“一个勤勉的、有点阅历的、自身生命节奏与高加林同步的导演”自况。前两点特质使得他在《人生》被再一次影视化时站在了“追求一部升级版人生故事”的起点，而“自身生命节奏与高加林同步的导演”兴许才是更深层次的创作底气。

阎建钢说，40多年前，作家路遥以对文学超乎寻常的虔诚创作了《人生》，用他个人在平凡世界中的体悟与热爱书写了土地与奋斗，为那个混沌又昂扬的时代和在彼时的悸动青春带去启示、鼓舞，“无可避免地，那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都被小说《人生》所影响、所撼动，包括当时正在上大学的我以及剧组里的许多成员，我们有着与路遥、高加林相同或类似的心理和情感结构”。由此，电视剧《人生之路》的创作过程，更像是一群与路遥惺惺相惜的人在经历了比作家更为漫长的生命体验后回望他们那一代的青春，并在其中交付自己更具时间纵深的自我体悟。

“我有兴趣、也有责任把我们这代人当时的青春状态、青春感悟拍出来。若新的《人生之路》能和今天的年轻人对话，就像我们当年产生的共鸣那样，我觉得就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阎建钢说。

情感与情怀：青春、挫折、奋斗的命题永不过时

为什么再拍？尤其是与原著首发的1982年相隔40年的今天，尤其在同名电影等早已成经典之后？类似问题，从《人生之路》立项之初就是主创反复自问、也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阎建钢从情感与情怀的不同层面给出答案：“小说《人生》对于有着特殊的情感、情怀，情感是个人的，情怀属于一代人和一个时代。”个体的情感与时代的情怀交融，驱动着创作者们开启《人生之路》。更重要的是，在重读、重解原著小说时，阎建钢发现，无论小说甫一面世即引发的社会大讨论抑或今天的再次品读，几乎所有的题眼都离不开青春，“岁月不居，但无论哪个年代，青春、挫折、奋斗的命题永不过时，这三个词对任何代际的人都不会过时——谁不曾年轻过，谁不曾青春道路上与挫折不期而遇，遭遇挫折后，作何选择、如何奋斗以改变命运，又是一道能超越时间的人生课题”。

“如果说当年高加林的故事之所以影响中国，源自作家极其真实、诚实地直面了青春课题，深受他小说影响的那代人有许多而今已成了国家栋梁，这些人的血液里都有路遥《人生》的文化基因；那么40年后我们再度求解人生之路，则因为对青春话题的探讨是个永恒热点，每个人的青春或多或少决定着一个个民族、国家的明天，我们需要与今天的年轻人建立起新的关于青春、挫折、奋斗的共鸣。”阎建钢如是说。在他眼里，很多人遇到挫折后难免怨天尤人，高加林的可贵之处，是他能在抱怨、消沉之后努力改变现状，“他身上的坚韧和不屈，我觉得可能是



导演 阎建钢

‘奋斗’的内核，也是希望通过电视剧的观照，让今天的年轻人从高加林身上读解到的能量，从而为自己注入不断奋斗前行的活力”。

事实上，电视剧创作者的观点与作家当年的创作何其相似。1981年夏天，作家翻滚于心中两年的故事在21个昼夜里一气呵成。小说的最后是开放性的，路遥甚至还在二十三章注明了“并非结局”的字样，《人生》的续集也成了几代人心头的意难平。高加林未完待续的人生篇章跃动着路遥对他身处年代的切肤体验和深刻理解，这种体验既是私人性的，也是时代性的。

“所以我们试图补齐作家当年尚不及表达的内涵，在讲故事的方式上，首先做了结构性调整，希望与时代建立关联，距离今天的观众更近一些。”阎建钢表示，严格意义上讲，《人生之路》部分取材自小说《人生》，新剧为高加林的人生延展出了前言和后语。原著的故事线始于高加林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而回到土地，收束于他离开乡土后经历一番辗转、失去后的二次回归。“小说的最后，遭遇了最大一次人生挫折后，高加林消沉地回到村里，作家给读者留下个问号：才23岁的高加林还会往何处去，他究竟如何延续自己的人生？我们从高加林的高中时光拍到新时代初，想通过故事时空的扩容，来拓展对‘人生’这个大词的认知。”阎建钢说，他希望观众从《人生之路》中看到高加林的命运，得到对自己人生之路的一种反思——这话，冥冥之中似在回应路遥当年的叩问。1981年夏天，高加林的故事在路遥笔下诞生，作家曾为其暂定名《你得到了什么》。

续写与升级：于文学的当代性中读解世界观的升维

为什么是上海？电视剧《人生之路》不仅在更长的时间轴上续写，剧本还拓展高加林的奋斗空间，抒写了陕北青年在人生谷底重新抖擞精神、经自身奋斗走进上海的旅程。阎建钢以同代人视角揣摩高

加林的内心：“他从青春时代就有个志向，要去上海。为什么一定是上海？因为当年就在上海的石库门，13位年轻人通过奋斗建立崭新政党，从此改变中国。上海是许多有志者都向往过的地方之一。”而跳出剧本，导演从广阔现实中判断：“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风的中国，最接近现代化文明、开风气之先的城市里有上海，八方来风、最具活力的城市里也有上海；上海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启航地和当代发展重镇，许多文学刊物坐标上海，几代文学青年心向往之”。

历史的底蕴与现实的蓬勃同时召唤着高加林，上海，成了他眺望的远方，也成了《人生之路》的合理选项。阎建钢“剧透”，新剧里高加林第一部重要作品的发表和获奖就在上海，一如历史的进程中，1982年，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首发，路遥的成名作从上海走向中国。采访中，导演阐述始终贯穿着“变与不变”，那是忠于“文学当代性”的思辨。从《人生》面世的1982年到《人生之路》开机的2022年，青春、挫折、奋斗的人生复调是不变的，也是电视剧对原著的遵循；而人们的世界观、审美体验、社会情绪无可避免地随时代转移了，是需要电视剧创作者在时代语境中力求升维的。导演这样定义他们的创作追求：“我们要做一部升级版人生故事。”升级，不止于技术层面用最好的设备、加强的拍摄手段等，而是在世界观和价值层面让时代中人们的新知显影。他打比方说，“上世纪80年代的高加林们不会知晓平行宇宙理论，但2023年，世界科技抵达新高度，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会有所更迭”。

比如审美的层面，“那会儿的巧珍烫个脑袋可能就被视作特立独行，置于现在稀松平常”。比如社会情绪上，作家写就的《人生》，是基于他对彼时中国农村青年想要打破土地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强烈渴望的体察；小说里第一幕与最终章都有眼泪，折射着路遥对他所处年代穴位的回避、不 retreat。40年沧海桑田，在作家没预见的2023年，阎建钢希望在影像表达中更多地张扬人物身上的生命力，“当我们回望1980

年代，当时年轻人身上最可贵的就是充满着活力、生命的张力，对未来虽不清晰但足够蓬勃的想象。为此，新剧开篇像小说一样在乌云密布的坏天气里让郁郁寡欢的陕北青年登场。阎建钢特别设计的开场里，高加林和高双喜骑着“二八大杠”一路飞驰，从老家沟到县城，20多里山路起伏伏，混剪的画面里经过昼夜轮回、山川流转，年轻人迎着朝阳出发，又在夕阳下的苍茫壮阔里归来，“节奏极快，冲力极强，车都快骑散架了，但丝毫不影响他们释放无尽的生命能量，那段开场很酷也很燃”。

再看爱情观。1981年写作的路遥无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写到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两段情感经历时，将人物的个体抉择嵌入社会背景即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小说初面世，对高加林爱情观的是非评判，读者展开了激烈交锋。阎建钢认为，更为开放包容的今天，在不背离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年轻人的情感波折或转移并不构成所谓“污点”，很多时候，情感的变迁是伴随着生命体验的改变而发生。导演还曾与演员交换过看法，陈晓答覆，“我可以理解，当一个年轻人遇到人生灾难、生命失衡后，会寻求平衡的手段，感情可能是其中一个抓手”。

《人生之路》即将展现的高加林，“他会权衡我这一生去往何处，将度过怎样的人生，要追求的最高价值会是什么——生命中经过的一切都可能促成新的选择，这是根据他的最高价值观来调整的”。阎建钢说，对于高加林，他面对人生课题做出的步步调整都具有当时刻的合理性；对今天的观众，当大家带着更丰盛的阅历观察高加林的青春世界，城市与农村、理想与现实，都可能突破纯粹的二元对立关系。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陕北，它所涉内核又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无远弗届。

拍摄与表演：建立“真实”二字是创作的最大自信

为什么是这些演员？《人生之路》台前幕后的人能否成就这代观众认可的高加林们？拉直前

一个问号，阎建钢说“外形合适、演技过硬缺一不可”；后半部分的疑问，很大程度可以交付“真实”。

在成为高加林之前，陈晓的作品序列里囊括古装、谍战、革命、医疗、都市情感、当代军旅等丰富类型，但偏还没有一个与《人生》的岁月并行的角色。导演不以为然：“以往的角色只作个外围参照，以佐证他对不同境遇中角色气质的塑造能力。我的习惯必须和演员面对面做一次交流，在同一气场中互相感知。我始终相信，所谓‘挑演员’并非单向的，演员是否足够信任导演，也是合作的前提。”

阎建钢与演员有次长谈，“陈晓是做了充分准备来的。他看过小说，看过剧本，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交谈中，双方聊到路遥小说的认知，聊两人不同的创作经历，甚至还聊起家庭……凡此种种让演员在年龄、外形背后属于“人”的气场与角色所需渐渐重合，也让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双向信任开始建立，合作便是一拍即合的事。“陈晓的内心很丰富，看似少年老成偏内向，实则富于极大极强的激情。高加林亦如此，正是这些特质构筑了人物坚韧的性格底色，让他在承受磨难时能有重整出发的勇气。”阎建钢说，“陈晓是个感悟力很强的演员，他在高加林身上找到相似的个性切入点，就会调动生命感受移植到角色身上。”更遑论，演员还留下一句对现实主义的告白，“我希望能用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完成创作累积，希望以此作为献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后来，陈晓的35岁生日就是在《人生之路》剧组度过的，一名演员就此将人生的重要里程碑、职业规划牵系于一次现实主义创作。

李沁也是导演口中“完全信任”的演员。对受到路遥偏爱、如金子般珍贵的刘巧珍，阎建钢如此勾勒角色：“按今天的说法，她应该是当年陕北山村里的‘大众女神’，美貌不必惊世骇俗，但足够朴实漂亮干净，尤其身上能散发出张扬的活力。这样的女性不在乎任何生命难题，有能力在高加林最痛最难时支撑他、激励他。”外貌气质与演技的硬条件相加，李沁就是刘巧珍的不二人选。循着相似理念，会跳舞的张嘉倪成为黄亚萍的优选，林永健、刘威、李光复等戏骨级演员依次成就高明楼、刘立本、德顺等三位在高加林人生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陕北老汉；周野芒、郭晓婷等上海籍实力派，为续写的上海故事线平添可信度。

《人生之路》与观众见面的日子，年代剧俨然新晋的荧屏“流量担当”。而硬币的另一面，观众为40多年前父兄一辈的生活痴迷同时，也对剧中渐近的日子越发挑剔。阎建钢觉得，这关乎大家对真实性要求的不断增长，“距离今天越远，假定性的生活越容易被接受；而越是切近今天、与时代同步，一丁点不真实，就会被观众戳破”。导演说，小说《人生》是路遥直面真实生活的一次创作，40年后，“《人生之路》对真实的要求也可称‘苛刻’”。

“我有幸得到了一支千锤百炼的队伍共同抵达真实。”参与过北京奥运会造型设计的陈敏正为演员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人物的造型体系；手握金鹰等重要奖项的美术指导刘勇奇实景再造了路遥所处的陕北风貌，清涧县、马店小学、高家沟的家家户户，小到茶杯、农具，大到风雨痕迹、各家院落不同的窑洞数量，都在逼近40年前的景观；摄影团队在路遥故乡深耕，拍到极其壮阔的黄河，也拍了旁人镜头未及的奇绝地貌。

剧本、服化道、表演都在各自维度塑造真实，一旦逻辑真实、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一同奏效，观众自会动容——阎建钢说，创作者的最大自信莫过于此。

2023，我的就业故事⑦

全力以赴，给人生一个确定的锚点

上海中医药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朱耀言坚定职业志向成为疾控“新兵”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既顺利通过研究生笔试，又拿到心仪单位的录用通知，乍听之下，这绝对是当前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中的赢家。

谈及这份幸运，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预防医学专业2023届本科毕业生朱耀言则显得淡定，“那时睁开眼就是看书，像我这么复习，很难考不上”。

与这名00后年轻人聊就业、聊考研，会收获一个个务实而干脆的回答。朱耀言的就业故事，不是“幸运”两个字可以简单概括的。一次次全力以赴，让他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一个个确定的锚点。

“如果学习是为了找一份心仪工作，我找到了”

2月21日晚上9点多，朱耀言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原来真的有人复习一年多，考前三个月从早上九点背5遍单词连续打卡500天，英语课刷黄皮书，政治笔记记了两本，最后考出来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准备去单位上班。这个人不会是我吧！”

一年的辛苦备考换来不错的考研笔试成绩，这个年轻人难掩喜悦。

与此同时，他拿到了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签约意向，顺利的话，今年7月本科毕业就将入职。

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继续读研，还是成为一名疾控“新兵”？一个是梦想专业，一个是梦想职业，两个都是好结果，怎么选？朱耀言决定——先就业！

3月15日，在学校老师的见证下，他与宝山区疾控中心签下三方协议。朱耀言笑着，没继续追逐复旦的考研路，外人看着有点可惜，他自己倒没啥纠结。“如果学习是为了找一份心仪工作，我找到了。”

干疾控很苦？“早有清醒认识”

干疾控这一行很苦，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朱耀言坦言，“早有清醒认识”。

2018年，朱耀言高三毕业，在一众学校中主动选择读医，并最终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一个年轻的专业——预防医学专业。医学院普遍为长学制，这是一个五年制的本科项目。医学注重实践，早在大一时，朱耀

言就分配进入长宁区疾控实习，这算是与未来职业的初次见面。令他和同学们意外的是，“第二次见面，记忆如此深刻”。2019年，大二上学期读完，与寒假几乎同时到来的，是一场后来席卷全球的疫情。

本科时代，三年新冠疫情横穿而过，其他大学生对本科的记忆或许是上网课，而朱耀言和同学们则直接投入到战“疫”一线。当时，朱耀言被分派到家属附近的宝山区疾控。

穿着“大白”，随时待命，跟着老师们学着做流行病学调查，整理新冠病毒的国内外资料……朱耀言对这些在疾控的日子历历在目。

环顾周边，朱耀言的同学们也分到了市、区疾控实习。“记得报到第一天，老师说‘同学们，我们就把你们当自己人了’，没想到，后来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刻，同学们跟着疾控的老师们一起，周末连着熬夜。”

他还记得，最缺人手的时候，有疾控老师开玩笑地说，“去楼上交一个简历，直接可以上班了”。如今，这些经历，不时被朱耀言和同学们拿来作为大学五年的珍贵回忆。笑中带泪的实习经历，没有劝退这些年轻人，反而坚定了朱耀言和一些同学的志向。

“离家近”也成了求职的优势

关于吃苦这件事，这群学医的年轻人与一般人的理解确实不同。

“如果苦和累也有一个排序，以我目前的学习经历，按程度从重到轻往下排，依次是：本科的期末考试、考研，最后才是高考。”朱耀言坦言，学医五年如同读了一把“加强版的高三”，每天都在学习，周末也不例外。

考研也成为医学院里一件特别顺理成章的事——到了大二、大三，人人都开始准备考研。除了去医院、疾控实习，专业课程学完，大家也是忙考研，瞄准心仪的学校、专业，全力复习。

“选择了医学，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太轻松的路。但回头想想，学了整整五年，毕业后去找一份跟专业无关的工作，我不甘心。学医五年、职业与所学专业对口，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临近毕业季，朱耀言在忙着毕业论文收尾的同时，准备锻炼身体，给未来的疾控岁月打好身体的底子。

朱耀言的家距离宝山区疾控仅10分钟左右的路程，他笑着，这也属于别人眼里的梦想职业——离家近。这一重要优势也让他面试中加分，因为疾控人的工作性质，需要24小时随时随到。

步步为新，为传统戏曲寻找未来坐标

(上接第一版)于地域而言，远道而来的蓝面具藏戏贡献了沪上舞台鲜能见到的“温巴顿”“扎西”等充满仪式感的表演环节；而于地方戏的突破看，扬剧、北京曲剧、吕剧打开了剧种“还能这样演”的新格局，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老舍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明话本《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都在从未有过的戏曲译译中实现了经典的艺术再生。

值得关注的是，展演的集聚效应推动戏曲人之间的相互切磋，“焕新”的火花四处迸发闪耀。到上海的第二晚，陈亚萍就在宛平剧院欣赏了上海昆剧团《三勘》。在与同行的交流中，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在小剧场摸索的身影：想要尽力一搏，却也带着些谨慎诚恐。

“戏曲不应该与时代脱节，不管成功与否，都得不停地尝试。”陈亚萍台上扮飞舞动的水袖，舞出的也是真剧人的奋力前行。

恣意挥洒朝气，辨认戏曲未来

“年轻观众走进小剧场，常常带着一层好奇心。”在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中饰演“我”的王厚义和不少00后的同龄人一样，常会选择密室和剧本杀作为平日里的休闲方式，在他眼中，小剧场观演可以被视作另一种风格的沉浸式体验。巧合的是，好听、好看、好玩正是《我这一辈子》想要完成的目标。该剧谢幕后，剧组邀请观众现场“面对谢群”，直面最真实的反响——

“看得热血沸腾”、“售罄满座都不够，这戏值得被更多‘看见’”。包容与开放是小剧场最大的魅力，无论是年轻还是古老的剧种，都能在此找到安身之处。由老舍1952年命名的北京曲剧是我国最年轻的剧种之一。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导演白爱莲在这部作品中延续着她的“小剧场大时空”理念。观众看到一批去国刚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00后演员在“打新春”“金钱莲花落”“靠山调”等传统曲牌中尽情张弛着意识流，社会众生幻化为意象一群“纸人”——类似古希腊戏剧歌队的形式强化了歌舞性，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演一出悲剧。

蓬勃的朝气与创作的活力时刻涌动在小剧场的空气中，在这里，拥有400年历史的汉剧可以拥抱文人戏与革命题材。武汉汉剧院的青年编导胡晓琼从流传后世散文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提炼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山涛之间超越生死的情义，恣意呈现在汉剧《一梦幽篁》中。在她看来，缩短与观众心理距离的小剧场是“探索文本思辨性与哲学性的不二场所”。在执导小剧场戏曲之前，胡晓琼也曾排演过小剧场话剧，她感叹于戏曲本体的博大精深与唱念做打丰富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剧本创作、表演方式、舞美设计、音乐创作在适配小剧场的过程中都逐一有所改变。一次次的尝试和摸索后，年轻的汉剧人隐约感觉到——“或许就是在这里，将要孕育出新的戏曲样式”。